

越文化视野下的 蔡元培及其美育思想

马芹芬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越文化视野下的 蔡元培及其美育思想

马芹芬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文化视野下的蔡元培及其美育思想/马芹芬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 - 7 - 5203 - 0879 - 3

I. ①越… II. ①马… III. ①蔡元培(1867 - 1940)—美育—
思想评论 IV. ①G40 - 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041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56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课题编号：12JCJY18YB）
绍兴文理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关于越文化精神的基本阐释	(3)
第一节 勇猛刚毅的胆剑精神	(5)
第二节 柔韧智慧而不乏仁德的文化精神	(11)
第三节 理性务实、勤劳节俭的文化精神	(17)
第四节 开放包容与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	(25)
第五节 优美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艺术精神	(32)
第六节 兴学重教的风尚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38)
第二章 越文化视野下蔡元培的生活	(52)
第一节 蔡元培在越地的成长历程	(52)
第二节 蔡元培与越地山水之情	(67)
第三节 蔡元培与越地教育文化	(83)
第四节 蔡元培与越地名贤文化	(97)
第五节 蔡元培与越地民俗艺术	(121)
第三章 越文化视野下蔡元培的人格精神	(138)
第一节 越文化视野下蔡元培救国为民的爱国情怀	(139)
第二节 越文化视野下蔡元培自由包容的博大胸怀	(152)
第三节 越文化视野下蔡元培务实理性的处世风格	(164)
第四节 越文化视野下蔡元培刚柔兼济的人格精神	(183)



第四章 越文化视野下蔡元培的美育思想	(199)
第一节 越文化视野下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哲学渊源	(200)
第二节 越文化视野下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211)
第三节 越文化视野下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221)
第四节 越文化视野下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247)
参考文献	(263)
后记	(266)

导　　言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原籍诸暨陈蔡，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美育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在素有“鉴湖越台名士乡”之称的绍兴，虽然“士比鲫鱼多”，但是像蔡元培这样生于斯、长于斯、成名于斯，且深爱着斯的越地名士却为数不多。据统计，在《绍兴名士》中收录的绍兴文化史上最有代表性的 15 位文化名人中，发现纯粹绍兴土著的名士有贺知章，杨维桢、徐渭、刘宗周、章学诚、秋瑾、蔡元培七人，占了 46.7%；可以算绍兴土著，但文化血脉中程度不同地带上其他区域文化成分的，有王充、陆游、王阳明、张岱、鲁迅五人，占 33.3%；纯粹移民身份者，有范蠡、王羲之、谢安三人，占 20%。可见，从绍兴文化创造主体之主体——精英人物的组成来看，十分纯粹的绍兴土著出身，先天文化血缘中基本没有异域文化因子的只占不到一半，如果把父亲籍贯在绍兴但生于外地的绍兴人后裔，如清初的张竹坡，近代的朱自清、周恩来等加上，纯粹绍兴土著出身的比例还要小。^① 而蔡元培却是为数不多的纯粹的越地名士。

辜鸿铭曾说：“要估计一个文明，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它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人（What hope of humanity），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产生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② 辜鸿铭把文化对人的意义看成是首要的，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人创造文化，同

^① 潘成玉：《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20 页。

^②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3 页。



时文化也创造人。“对每一代人（或个人）而言，要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必须先成为文化的创造物。”^①

因此，蔡元培等越地名士在成为越文化的创造者之前，他们也是越文化的创造物。一方面，他们思想和人格精神的形成会受越文化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为越文化注入了新内容，充实和丰富了越文化的精神内涵。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我们发现，研究越地名士与越文化之关系的论文、论著已有不少。如关于鲁迅与越文化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已颇为丰硕，这些研究从各个方面阐释了鲁迅及其文章风格与越文化之间的关系，如陈越主编的《越文化视野中的鲁迅》，那秋生的《鲁迅与越风》，王晓初的《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等。此外，关于陆游、周作人、郁达夫、茅盾、许钦文等与越文化之关系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也已不少。其中，论著有鲁雪莉的《许钦文传论：越文化视野中的乡土作家》，研究论文有《郁达夫与吴越文化》《论茅盾小说与吴越文化》《茅盾与吴越文化》《地域文化背景与作家的文学个性差异——吴越文化视域中的鲁迅与茅盾》等。但研究蔡元培与越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著还不曾出现，研究文章也很少见到。而蔡元培作为一名纯粹的越地土著名士，其思想精神的形成自然离不开越地山水自然和历史文化的哺育。鉴于此，本书拟从越文化入手，对蔡元培在越地的生活作一梳理，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越文化精神对蔡元培人格精神及其美育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以不断开拓蔡元培与越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范畴。

^① 朱志勇：《越文化精神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第一章 关于越文化精神的基本阐释

越文化的发展演进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越文化经历了越族文化到越地文化的转变，越文化的主体经历了从越地越族人到越地汉族人的转变。因此，关于越文化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越文化是一个区域文化的概念；但也有学者认为，越文化是一种民族文化。2012年在绍兴召开的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越文化在其主要涵摄上，不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而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概念。所以，所谓越文化，指的是古代越族所创造的文化。”^①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是民族文化，还是区域文化，都是由生活在某个民族或区域的人群共同创造并为他们共同享有的文化。所以，从其文化形成之始看，越文化是于越民族创造的文化。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于越民族因各种原因而迁徙于世界各地。迁徙到世界各地的越族成员，其文化思想很可能已被异域文化所同化。但在越族人最初聚居的地方，这种民族文化却被沉淀下来，并随着历史的发展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最终成为一种区域性的文化。可见，越文化在其形成之初更多的是一种民族文化，但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随着越文化主体实现了由越地越族人向越地汉族人的转变，越地文化也实现了由越族文化到越地文化的转变。因为此时的“越地文化并不只是越族文化的传承和嬗变。越族文化是越地文化的一个源头，另一个源头是中原文化，二者在秦灭越国后的第一次移民潮期间交汇，共

^① 周幼涛：《越文化与区域文化研究》，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绍兴，2012年11月，第273页。

同形成了越地文化”^①。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越文化是指越地文化，它是由古代越族人和中原移民共同在越地创造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

那么，越地又是指哪些地方呢？越地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怎样的区域文化精神呢？对于这些问题，越文化研究的专家们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书在吸收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越文化的概念和精神作一简单梳理，以便更好地把握蔡元培与越文化之间的关系。

首先，越地的概念范围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它最初是指越族人生活的地方。而“越族先民主要分布在钱塘江以南，大致生活在宁绍平原上，其中心是今绍兴地区”^②。因此，有学者认为，越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其核心区是“以绍兴为中心的方圆一百公里左右的地区”，亦称“越中”。“越文化的基本区是古越国领土比较稳定的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而“越文化的边界区是越文化基本区周围的地区，它曾属于古越国的版图，也曾属于其他诸侯国的版图”^③。按这样的划分标准，蔡元培自幼正好出生并成长于越文化的核心区，即越中地区。虽然蔡元培外出做官以后，随着其活动圈子的不断扩大，其心中的故乡概念也有所扩大，但这是他成名以后的故乡概念，其实对蔡元培人格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是他自幼生活的故乡绍兴。因此，本书拟以越文化的核心区——“越中”地区为范围来考察越文化精神，阐释古老的越族人民及其历史移民在越中地区创造的文化精神。

关于“越中”地区，清代吴悔堂在其所著方志《越中杂识·越中图识》中解释道：“绍兴府在浙江省城东南一百三十八里，东西广二百九十里，南北袤四百四十七里。依江濒海，山秀水清，风景常新，英贤辈出。属邑八：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东至宁波府慈溪县界，西至杭州府钱塘县界，南至金华府义乌县界，北至大海，东南至台州府天台县界，西南至杭州府富阳县界，西

① 朱志勇：《越文化精神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126页。

③ 同上书，第2页。



北至杭州府钱塘县界，东北至宁波府慈溪县界。濒海之邑凡五：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是也；濒浙江之邑一，萧山是也。”根据吴悔堂先生的描述，越中地区坐陆靠山，依江濒海，风景秀美。这一地形特征和山水风景对越地民俗文化和区域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节 勇猛刚毅的胆剑精神

关于越地的人格精神，鲁迅先生曾说：“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① 潘成玉先生则称之为“山性”“石气”^②。这些说法不仅是对越地区域人格的一种精当概括，也包含了对越地地理环境和文化发展关系的体悟。俗语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自然环境作为无法选择的对象，从一开始就大致规定了这个地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而决定了他们的精神取向和发展基调。因此，一个地方有怎样的自然环境，这个地方就有怎样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精神。“虽然在文明的进程中，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呈现递减趋势，但不可能消失，人毕竟是自然的存在物。”所以，“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进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③。可见，自然环境对地域文化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那么，越中地区的自然山水环境对越地文化精神有何影响呢？

首先，越地多山。从大的范围看，越中地区的山自西南向东北方向扩展延伸，排成四列：第一列是西北边的龙门山脉，它是富春江和浦阳江水系的分水岭；第二列为会稽山脉，它是越中山水的骨骼。此山脉介于浦阳江和曹娥江水系之间，山势自西南向东北延伸，逐渐变低，最后没入萧绍平原，成为散落在平原上的一座座小丘。第三列是四明山脉，介于上虞区、嵊州市、余姚市之间。第四列为大盘山和天

^① 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鲁迅回忆录》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7页。

^② 潘成玉：《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③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页。



台山，介于新昌县、宁波市和天台地区之间。从小的范围看，一列列大山散落成一座座高俊秀丽的山峰，这样的山峰在越中地区可谓鳞次栉比。山，有着万壑峥嵘的磅礴气势，有着云蒸霞蔚的壮阔，有着烟雾缭绕的幽远，在清澈澄净中透出清新灵秀，在茂林修竹和松石香兰的秀丽山色中散发着清幽芳香，展示着刚硬坚强和耿直不屈的品节。所以，山不仅是越地先民最早的生活栖息之地，而且是越文化精神的孕育之地。越地先民长期栖息于多山的环境里，山的“石气”以及“松风”“竹节”潜移默化地作用于越地先民，就形成了一种像山石那样挺拔强悍、质朴峻烈、刚硬正直的人格精神，一种面对灾难困境时励志图强、绝处求生、慷慨复仇的“胆剑精神”^①。

其次，越地不但多山，而且多水。多水环境在给越地先民带来智慧和食物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众多灾难。刚毅坚强的“山岳气”反映在越民身上，就是一种与洪水海浪勇敢搏击的抗争精神。

当古越大地面临洪水肆虐的时候，大禹继承父业，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劳身焦虑，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洪水，给人民带来安定的生活环境。大禹治水，与天地斗争，平定九州，可谓勇气超人。

面对茫茫大海，生活在沿海的古越先民与惊涛骇浪进行着生死较量。他们的抗争既反映了古代越地险恶的生存环境，也反映了古越人敢于抗争、善于斗争的英勇品质。

古越人的勇猛刚毅不仅体现在与自然山水的抗争上，也体现在与异族人类的抗争上。据陈桥驿先生的观点，距今15000年以前，假轮虫海退使中国东部沿海平原空前扩大，今天的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舟山群岛在当时曾连成一片。但距今五六千年前，随着最后一次卷转虫海侵的发生，古越部族的生存空间大大缩小了。海水涨到会稽山、四明山的山麓线，海平面一直扩展到会稽山腹部的平水镇。因此，古越人不得不纷纷出走，其中一支迁徙到了会稽、四明山地，其余则迁徙他乡，有的甚至漂洋过海，远渡异域。传说于越先民在迁徙山地的过程中，是以尸堆成山、血流成河为代价的。为进驻山地，他

^① 潘成玉：《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们与山地土著人大战；进驻山地后，土著人的偷袭骚扰，于越先民的不时回击，也从未间断过。在肉搏血战和刀光剑影中，古越人凭着勇武强悍的抗争精神，为自己在四明、会稽山地争得一席生存之地。

在山中，没有了宜人的气候，没有了肥沃的土地，有的是坚硬瘠薄的土质，遮天蔽日的林木，以及毒蛇猛兽的出没。深处荒山野岭的“越人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①。面对艰险的生活环境，传说中的古越人“山行而水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②。此乃“越之常性”。这说明古越人把勇猛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倾向作为一种常态。这种文明的因子流淌在一代一代越人的血液中，到越王勾践时代，越人将“锐兵任死”“轻死易发”的强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吴越争霸时期，虽然越国国势日强，但北部强吴的存在严重威胁着越国的生存。越国与吴国，“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国语·越语上》）。二者之间不容并存。对国力相对较弱的越国来讲，形势更为严峻。夫椒之战，越国被打败，吴王夫差将越国推向了覆亡的危险境地。但就是在这样濒临亡国的绝境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最后消灭强吴，成就一代霸业。古越人强悍好勇、轻死易发的刚强蛮风，经过吴越征伐的培育，创造出“三千越甲可吞吴”的神话，这充分表明越人的骁勇善战、强悍异常。战国时期，中原人视越人为猛虎，可见越人之勇猛已闻名于世。^③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越民这种强悍好斗的勇武之气逐渐形成了一种尚武好剑的古越民风。越剑是这种精神品质的载体和表征。《汉书·地理志》载：“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越绝书》卷十一载：“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太一下观，天精下之。”这些神奇的描述，反映出古越民族对剑的原始崇拜。“当越人的好剑轻死与民族的复仇精神叠加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强悍和野蛮之

^① 班固编撰：《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69页。

^② 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③ 朱志勇：《越文化精神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气少了，而多了一种高拔、阔大的气象与境界”^①。这种勇猛、刚烈的古越之风，在勾践复国的神话般的奇迹面前，演绎成一种“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的越文化精神。

所谓“慷慨以复仇”就是指处在“绝处”和“死地”中的越地人，不会束手待毙，而是奋起反抗，拼死一搏的精神。^② 大禹为民除害，敢于与洪水作生死搏斗；越王勾践面对亡国的危险境地，敢于与吴王斡旋。这种强悍、豪蛮的品质，千百年来传承不断，成为一地之风气。这种风气反映在越地士大夫身上，则形成了一种傲骨嶙峋、敢于挑战权威，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的不屈精神。

会稽太守马臻为民造福，敢于不顾豪强劣绅的反对，主持修建鉴湖水利工程，哪怕被处以极刑也在所不惜。东汉王充敢于以惊世骇俗的言论，批判当时官方的谶纬学说，将古代唯物主义推向了新的高峰。陆游面对国土的沦陷，敢于用慷慨激昂的诗句鞭挞投降派，号召人民起来抗战。沈炼嫉恶如仇，敢于弹劾权臣严嵩。王阳明敢于同程朱理学叫板，独创阳明学说。刘宗周，性格耿直，敢于直言，敢于忤逆权贵，甚至敢于忤逆崇祯皇帝。尽管最后被革职为民，但当北京陷落、崇祯自缢之际，刘宗周徒步荷戈，来到杭州，督责巡抚黄鸣骏发丧讨贼。当南京陷落，潞王投降之后，宗周绝望以极，绝食而死。

祁彪佳，为官清廉有为，敢于直言谏诤，虽屡遭权贵弹劾，但他绝不屈服。清兵入关，祁彪佳坚持抗清，不屈不挠。面对清王朝的礼聘，祁彪佳断然拒绝。当清兵渡钱塘江后，祁彪佳绝食三天，留下绝命词“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自沉于寓园梅花阁池中。

王思任，山阴人，抗清忠臣。1645年清兵攻陷南京，奸臣马士英称皇太后制，逃奔至浙江。王思任撰文痛骂马士英奸相，并义正词严地指出“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清朝统治者带着礼物，企图诱降。王思任将大门紧闭，大书“不降”二字，决不与清统治者合作，最后亦绝食而亡。

明亡之际，绍兴府余姚的朱舜水，清兵占领浙江之后，他出入浙

^① 朱志勇：《越文化精神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② 同上书，第115页。

东义军诸部，积极参与抗清事业。四次东渡日本借兵，以图恢复明室，大事未成，最后流亡日本，绝不事清。

在清代，黄宗羲敢于抨击封建君王的专制统治，大胆提出“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的民主启蒙思想，成为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之一。

而当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越文化之“慷慨之气”便燃烧成为一股舍身救国、义无反顾的爱国主义烈火。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侵入柯桥，执乡民姚长子为向导，姚长子将之引入绝境，并设法传信官兵来歼。“贼知为所绐，杀长子，剗其尸。贼百三十馀人尽歼。”

嘉靖末年，“浙兵”群体疾风暴雨般驰骋于东南沿海，粉碎了倭寇的侵略，后又杨威于长城沿线，捍卫了北国边防。

清顺治五年（1648），萧山七都沈村乡民沈烈士、张锯匠起义反清，以两人之力打退上千清兵的围剿，直至力竭而亡。“北骑曰：‘自入关以来，未曾见此好蛮子。若再得十数人，江东非吾有矣。’退至新坝，侦探数日，闻沈、张二人死，不信，再迟数日，得确信，始纵骑上山，沈村一带，掳掠如洗。”^①

在太平天国时期，诸暨人何文庆在家乡组织民众，成立“莲蓬党”，积极响应太平军起义。1861年，太平军大举进入浙江时，何文庆率8000人加入太平军，先后转战新昌、天台、镇海和绍兴，与中外反动势力浴血奋斗，成为越地人崇拜的英雄。有民谣曰：“诸暨何文庆，眼睛似铜铃，眉毛似扛秤，起腿八百斤，攻上麻雀岭，从此天下立大名。”在1862年12月底的“绍兴保卫战”中，太平军和绍兴民众一道，打死侵略军头目勒伯勒东、达尔第福等人，谱写了反帝反封建的光辉篇章。

正是在这一地域文化背景下，在近代社会，越地涌现了一大批勇猛无畏、极富胆剑精神的仁人志士。蔡元培就是这批仁人志士的引领者。也许有人会说，蔡元培温文尔雅，用胆剑精神来形容他未必合适。其实不然，蔡元培虽性情温和宽厚，但也不乏刚毅坚强的胆剑精

^① 张岱：《石奎书后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1—322页。

神。这一点拟在第三章展开具体论述。

在蔡元培等绍籍进步知识分子的引领下，近代越地名士表现出来的慷慨大义最为光彩夺目。1904年11月，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这一重要的革命团体，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1905年出生于绍兴封建士绅家庭的徐锡麟，加入光复会，成为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和陶成章、秋瑾等通过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学堂，发展会党成员，培养和积蓄革命力量。绍兴成为光复会本部的活动中心。为开展革命活动，他与秋瑾约定在皖、浙两地同时举行起义。后因泄密，起义失败，徐锡麟被俘剜心。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看到陪斩学生朱蕴山等人时，向监斩官严厉指出：“杀恩铭者我一人尔，学生童年何知，系之何也，累及无辜不仁也。”同时急切地对学生发表临终演说：“满虏必灭，汉族必兴，我今天在安庆洒下一滴血，将来安庆要开无数之花。推翻虏廷，光复华夏，为期不远。”当他听到自己将被挖取心肝时，仰天大笑：“为革命可身分万片，区区心肝何所顾惜。”徐锡麟临刑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用自己的壮言烈行对越文化之胆剑精神作出了近代以来最为出色的诠释。

出生官僚地主家庭的秋瑾，出嫁到湖南首富之家，本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但她毅然献身革命，参加光复会，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随时准备以身许国。她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中国妇女还没有为革命流过血，请从我秋瑾开始吧。”她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金瓯已缺终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的庄严誓言。徐锡麟在安庆殉难之后，王金发劝她离开绍兴，暂避风头。她没有接受王金发的规劝，毅然表示：“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早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减少后来千百人的牺牲，不是我革命的失败，而是革命的成功。”为了革命，她甘愿自我牺牲，希望“以死唤起国人”，为同胞们树立为国捐躯的榜样。

在近代绍兴，除徐锡麟、秋瑾之外，还有陶成章，还有义无反顾投身反清斗争的翰林编修蔡元培，有被誉为“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鲁迅先生，有为捍卫其《新人口论》而公开向陈伯达、康生等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

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后退半步”的马寅初，等等。这就是越地名士绵延几千年的勇猛刚烈与不屈不挠的人格精神。这种勇武不屈的胆剑精神是越地先民在险山恶水中逐渐锤炼而成的。它“既是中华民族顽强不屈‘脊梁’精神的具体体现，更是越地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创造出悠久辉煌的越文化的内在力量”^①。

第二节 柔韧智慧而不乏仁德的文化精神

越地河流众多，湖泊纵横，水域面积广，水流形式丰富多样。有源于一列列山脉的山间小溪，如小舜江、若耶溪、剡溪等。有山间小溪汇聚而成的大江大河，如浦阳江、长乐江、澄潭江、新昌江、黄泽江等，它们历经重重阻挡，汇入幽远绵长的曹娥江。四列山脉孕育了千万条涓涓溪流，它们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东流入海。除此之外，还有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湖泊，有人工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和从杭州经绍兴、宁波直达东海的浙东运河，把这些大江、湖泊连成一体，形成了一个水量丰沛的庞大水体。难怪宋代诗人陆游发出了“稽山何巍巍，浙江水汤汤”的感叹。水是一切生命之源，也是民族文化之源。自古以来，水与水乡人们的文化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

面对滚滚东流的江水，孔子站在泗水之滨，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感叹，而老子盛赞“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认为人世间最高尚的品德就应当像水那样。它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别物争着处上，它却甘居卑下的地位。水这种“不争”“处下”的崇高品德接近于道。也只有像水那样与万物无争，人生才不会有烦恼，这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对此，孔子也有类似说法，“夫水者，启予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

^① 潘成玉：《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1—68页。